

編按：每年DSE公開試，都有狀元誕生，近年更有視障學生考獲佳績，他們的經歷，都能鼓勵在學的青少年如何克服困難努力學習。不過，這些開志故事畢竟佔少數，香港教育制度對於視力、聽力有障礙的學生來說，支援仍然不足；曾在外國進修的女生鄧凱雯，體會外逃與香港學校如何看待聽障者。今天，鄧凱雯同我們分享她的經歷，並談談她為探討聽障的紀錄片配音時的想法。

鄧 凱 雯

要 聽

兩個月前，香港電台邀請我為紀錄片《逆轉浮生：聾耳青年的聲音世界》配音，製演一名英國聾人少女。因為我是早產兒，導致有深度耳聾，故事中的五名聾人青年所遇到的學習困難、社交隔離和身分認同問題，我都感同身受。走進錄音室，看着對白，彷彿讓我重新經歷一次成長旅程……

口述：鄧凱雯 整理：林海容

我生於健聽家庭，在健聽的環境長大，努力成為健聽的一分子，儘管我知道自己與眾不同。我試過用頭髮把助聽器蓋起來，不向外人透露聽障的事，拒絕承認聾人的身分，可是隨着年歲增長，我感到迷失。在健聽的世界，我找不到身分認同，找不到同路人分享感受。

曾幾何時，我甚至有社交恐懼，因爲在朋友聚會，我常常聽不清楚大家講什麼；大家笑，我便跟着笑。漸漸地，我的性格變得被動，很難認識新朋友。直到大學畢業後，透過義工活動，我首次踏足聾人圈子，在聾人朋友身上找到共同和聯繫，找到了「我是誰」。

現在的我，就像聾、健兩個圈子的「混血兒」，希望可以發揮橋樑作用，拉近兩個圈子的距離。

在學的日子

紀錄片中的聾人學生帶着手語翻譯員和筆記員上課，正是我的親身經歷。我在加拿大讀書時，使用無線電FM收音機收聽導師講解，還有即時字幕翻譯和筆記員陪同上課。加拿大的專上學院，設有殘疾資源中心，申請支援服務並不困難。上課時，身邊的同學亦對筆記員習以爲常，不會投以奇異目光。

可是，當我回港修讀碩士時，情況卻截然不同。大學畢業後，透過義工活動，我首次踏足聾人圈子，在聾人朋友身上找到共同和聯繫，找到了「我是誰」。當時我向「保健部」查詢，令我哭笑不得。爲什麼大家會從病理角度，看待聾人學習需要？

經過一番轉折，終於在大學找到一部FM機，居然

是十幾年前的型號。後來得到大學的手語及聾人研究

教授們亦不習慣使用FM機。有一次，導師在課堂

中途才記起要啓動掛在胸前的收音器，還在全班同學面前向我道歉，問我能否聽到他說話，真是尷尬得很。

大學教育中，分組討論、做報告，是指定環節。可是每次分組時，同學們往往很快「埋堆」，總剩我一個人。我唯有調整心態，游說自己：別人同

組。

聾人的刻板印象

社會上其實有不少人願意幫助聾人，但健聽者往往以健聽的角度去看待聾人，把事情想得理所當然。例如，健聽的人總以爲「聾人」這個稱呼，會損害我們的自尊心，以爲使用「聽障

浮生》是一系列有關面對人生故事生活的電及播看選擇和環境的紀錄片，每一個面對人生的主人翁都在不同環境中面臨耳聾於香港電台外購紀錄片節目《逆轉浮生》，希望了解更多

經歷，都能鼓勵在學的青少年如何克服困難努力學習。不過，這些開志故事畢竟佔少數，香港教育制度對於視力、聽力有障礙的學生來說，支援仍然不足；曾在外國進修的女生鄧凱雯，體會外逃與香港學校如何看待聽障者。今天，鄧凱雯同我們分享她的經歷，並談談她為探討聽障的紀錄片配音時的想法。

我生於健聽家庭，在健聽的環境長大，努力成為健聽的一分子，儘管我知道自己與眾不同。我試過用頭髮把助聽器蓋起來，不向外人透露聽障的事，拒絕承認聾人的身分，可是隨着年歲增長，我感到迷失。在健聽的世界，我找不到身分認同，找不到同路人分享感受。

曾幾何時，我甚至有社交恐懼，因爲在朋友聚會，我常常聽不清楚大家講什麼；大家笑，我便跟着笑。漸漸地，我的性格變得被動，很難認識新朋友。直到大學畢業後，透過義工活動，我首次踏足聾人圈子，在聾人朋友身上找到共同和聯繫，找到了「我是誰」。

現在的我，就像聾、健兩個圈子的「混血兒」，希望可以發揮橋樑作用，拉近兩個圈子的距離。

學習手語的權利

長久以來，社會對手語存在不少誤解。人們總以爲，聾人學說話，才能改善生活，融入社會。香港教育政策，甚至將手語排除在外，就連聾人學校，都不禁用手語的方針，令社會大眾，包括我這個聾人，普遍對手語缺乏認知。在大學畢業前，我從來沒有接觸過手語。紀錄片中一名聾人青年談及，與同行朋友以手語溝通時，引來周邊的奇異目光。我和父母，都曾經是帶着奇異目光看手語的人。

小時候，父母安排我入讀設有言語治療的幼稚園。言語治療師跟媽媽說，學習手語可能會影響說話能力，從此我與手語隔絕。幸好我的耳朵有一點聽力，成爲少數可以流利說話的聾人，但對於聽不到任何聲音的聾人，要他們學習口語，只是強人所難，剝奪他們在年幼時期學習手語的黃金機會。

手語，其實是聾人的「母語」，就等同中國人說中文，英國人說英文，是語言的一種。沒有良好的母語基礎，聾人便無法與外界溝通，學習知識更是難上加難。我從加拿大畢業後返港後，到聾人組織做義工，開始認識手語，四年前更決定修讀語言學碩士，主修手語。父母得知後，對我說：「你千萬不要不說話。」

經過這幾年的努力，開始見到成果，讓身邊的人對手語有正確了解。父母受我影響，開始接納這種語言，更嘗試用一些不太正確的手語，與我的聾人朋友溝通，令我感到既尷尬又感動。

我希望整個社會，也可以像我父母一樣，改變一些根深蒂固的觀念。教育上，容許口語手語雙教學，讓聾人有公平的學習機會。職場上，僱主不再只問：「你會不會聽電話？」溝通的方式其實有很多種，可以面對面談，可以發郵件，不能接電話，可以用WhatsApp，不是嗎？

我生於健聽家庭，在健聽的環境長大，努力成為健聽的一分子，儘管我知道自己與眾不同。我試過用頭髮把助聽器蓋起來，不向外人透露聽障的事，拒絕承認聾人的身分，可是隨着年歲增長，我感到迷失。在健聽的世界，我找不到身分認同，找不到同路人分享感受。

曾幾何時，我甚至有社交恐懼，因爲在朋友聚會，我常常聽不清楚大家講什麼；大家笑，我便跟着笑。漸漸地，我的性格變得被動，很難認識新朋友。直到大學畢業後，透過義工活動，我首次踏足聾人圈子，在聾人朋友身上找到共同和聯繫，找到了「我是誰」。

現在的我，就像聾、健兩個圈子的「混血兒」，希望可以發揮橋樑作用，拉近兩個圈子的距離。

長久以來，社會對手語存在不少誤解。人們總以

爲，聾人學說話，才能改善生活，融入社會。香港教

育政策，甚至將手語排除在外，就連聾人學校，都不

禁用手語的方針，令社會大眾，包括我這個聾人，

普遍對手語缺乏認知。在大學畢業前，我從來沒有接

觸過手語。紀錄片中一名聾人青年談及，與同行朋友

以手語溝通時，引來周邊的奇異目光。我和父母，都

曾經是帶着奇異目光看手語的人。

小時候，父母安排我入讀設有言語治療的幼稚園。

言語治療師跟媽媽說，學習手語可能會影響說話能

力，從此我與手語隔絕。幸好我的耳朵有一點聽

力，成爲少數可以流利說話的聾人，但對於聽不到任

何聲音的聾人，要他們學習口語，只是強人所難，剝

奪他們在年幼時期學習手語的黃金機會。

手語，其實是聾人的「母語」，就等同中國人說中

文，英國人說英文，是語言的一種。沒有良好的母語

基礎，聾人便無法與外界溝通，學習知識更是難上加

難。我從加拿大畢業後返港後，到聾人組織做義

工，開始認識手語，四年前更決定修讀語言學碩士，

主修手語。父母得知後，對我說：「你千萬不要不說

話。」

經過這幾年的努力，開始見到成果，讓身邊的人對

手語有正確了解。父母受我影響，開始接納這種語

言，更嘗試用一些不太正確的手語，與我的聾人朋友

溝通，令我感到既尷尬又感動。

我希望整個社會，也可以像我父母一樣，改變一些

根深蒂固的觀念。教育上，容許口語手語雙教學，讓

聾人有公平的學習機會。職場上，僱主不再只問：

「你會不會聽電話？」溝通的方式其實有很多種，可

以面對面談，可以發郵件，不能接電話，可以用

WhatsApp，不是嗎？